

# 戍守与布防：明代云南府及其卫所分布探析

刘亚涛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明代云南府是云南布政使司的政治、交通、军事中心, 自然也是朝廷着力经营之地。作为稳定明朝在整个云南地区统治的基石, 自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后, 明廷就开始在云南府部署大量的军事卫所。在设置上, 云南府的卫所主要依托重要交通线和军事要地进行布防, 呈现出典型的“内重外轻”分布格局; 诸卫所之间互相策应、彼此联防, 构筑起严密的军事体系, 反映了当时明廷对云南地区的经略意图。

**关键词:** 明代; 云南府; 卫所; 戍守; 布防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2) 01 - 0025 - 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2.01.005

## Guarding and Defense: Analysis on Yunnan Fu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uard Towns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Yatao

(Yunnan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Yunnan Fu was the political, transportation and military center of the Yunnan Province, and it is also the focus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Ming central government over the entire Yunnan region, after the pacification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e 15th year of Hongwu emperor Taizu of the Ming Dynasty, that is 1382,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o deploy a large number of Guard Towns in Yunnan Fu. In terms of settings, the Guard Towns of Yunnan Prefecture mainly deployed along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lines and military sites for defense, showing a typical pattern of “heavy inside and light outside”, and the mutual interaction and defense between the Guard Towns built a tight military system, reflecting the contemporary central governmental strategic intention for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Yunnan Fu; Guard Towns; garrison; defense

云南府(今昆明市)位于明朝的西南边疆, 对于中原来说, 云南府是蛮荒之地、烟瘴之乡; 对于云南布政使司来说, 云南府是一省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中心。不同的视角, 造成了中原与边疆话语权的对立, 其原因正是由于云南府处在“中心”与“边缘”的“中间地带”, 具有“边疆”与“中心”二元性的地理特征。

云南府是云南布政使司(以下简称“云南”)的核心地带, 也是明廷在云南维持稳固统治的基石。由于云南本身具有政治、文化与地理的特殊

性, 域内族群及土司众多, 明朝为了维持在云南的有效统治, 主要依靠卫所驻军屯垦。云南府作为云南的核心区域, 在此的驻军布防就是重中之重。云南府境内的卫所都驻防在军事要地, 处在交通要道上, 这是云南府卫所分布的基本特征, 且整个云南卫所分布格局是典型的“内重外轻”。云南山高谷深, 农业经济产业都位于平坝与河谷地带, 环绕滇池流域地区自秦汉以来即是肥饶之地, 这就为卫所驻军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通过对云南府卫所布防的研究, 可以得出明朝在云南府的军事部署特

收稿日期: 2021 - 10 - 14

基金项目: 2020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戍守与布防: 明代云南府军营分布探析”(2020Y0350)。

作者简介: 刘亚涛(1986—), 男, 河南开封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史及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征,总结出明朝对整个云南的统治方略与政策。

### 一、王朝的边疆与边疆的中心

华夏王朝传统的边疆,历来被视为蛮夷之地,华夏与蛮、夷、戎、狄的五方格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所谓“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sup>[1]</sup>。《尚书·禹贡》亦有类似的记载。周振鹤在研究《禹贡》及《国语》的记载后,提出了著名的“圈层结构”。周先生认为:“五服制正是封建制的理想化,从中心统治区向外围水波纹似的推开去,正和‘商郊牧野’和国野制度的圈层型结构——城外是郊,郊外是牧,牧外是野——相似,这是过去现实制度的反映。”<sup>[2]</sup>这一“圈层结构”理论,是立足于地理空间在“均质”的条件下,从中央统治的华夏核心区向四方边疆区渐次铺展,形成“同心圆”式的统治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理空间并非是“均质”的,中间常有高山大川阻隔,从而形成不同的区域。既然“五服制”是理想化的制度,地理空间又非“均质”的,在实际情况下,就不可能像“同心圆”那样均匀地延展开来,中间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空隙。鲁西奇在对“内地的边缘”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后,“倾向于认为这种从核心到边缘的‘同心圆式’结构很可能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是‘千疮百孔的’,因为在这个体系的内部,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空隙’——即使是在帝国统治的腹地地带,也存在着这样的空隙”<sup>[3]257</sup>。如此来说,中央王朝的统治力并非是从中心向边缘由强渐弱,而是由于高山大川的阻挡,会形成不同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会由本区域的核心向外扩展,这一结构就是施坚雅提出的著名的“核心—边缘”结构。同时,施坚雅把整个帝国晚期的中国分为九大区域,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核心。<sup>[4]</sup>在大区之下又会分成次级区域,然后又分成小区域,小区域又可继续划分为更小的区域,对应行政区划当中,就是省—府—县—乡的行政分级。一般而言,每一个小的区域都有自己的核心,县城是一县之核心,府城是一府之核心,省城是一省之核心。鲁西奇根据“王朝统治的核心区”理论,进一步对“核心区”的内涵进行阐释:

在不同时期的中华帝国疆域内,均存在着不同层级的“核心区”,即不仅有统一帝国全国意义上的“核心区”与南北分裂格局下南北政权各自的“核心区”,还有不同层级区域下的“核心区”,如施坚雅所划分的中华帝国晚期九大区域各自的核心区,各层级行政区(州、道、路、省等高层政区,郡、府、州等中层政区,以及县级政区)内也都拥有自己的核心区。<sup>[3]15</sup>

其实,再小的区域都会有自己的核心区,小到一个小村落乃至一条街,都会有自己的核心区。村落的核心区往往位于区域的中心,旧时的宗祠或戏台所在的地方就是村落的中心。这就像一个拼盘,由最小的核心区一级一级地拼接为更大的核心区,最后拼成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当然,中央王朝的核心区与边疆区并非恒定不变,就中国古代王朝来说,不同朝代以及历史的不同时期,核心区与边疆区会随着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疆域的不同而不同,旧的核心区衰落了,就会形成新的核心区。尹建东指出:“边缘与中心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如果以‘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的话,可能会更容易看到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特点以及在各自不同层次地域中同样呈现出的‘中心—边缘’结构。”<sup>[5]</sup>由中央王朝到最小的村落核心区,这一重又一重的核心区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央王朝的核心区,那些处于基层的核心区,无疑属于边缘地带。

明代的云南府,相对于整个大明帝国而言,云南府处于帝国的西南边疆,但对于云南布政使司而言,云南府是云南布政使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无疑是整个云南的核心区。易言之,云南府既是“核心的边疆”,也是“边疆的核心”,是具有“边疆”与“核心”的双重特征。

在云南辖区内,政区设置与中原内地明显不同,除了卫所之外,中原内地一般的政区设置是府—县、府—州—县或直隶州—县。处于边疆的云南,除了与中原内地相同的行政区划设置外,还有大量的土司存在。陆韧提出了“边疆政区”<sup>[6]5-7</sup>的概念,注意到明朝中前期,“在边疆政区体制下逐渐建立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分层管理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新形势下西南边疆的地

理形势、地缘政治和边疆民族社会”<sup>[6]125</sup>。陆教授又进一步指出：

伴随着明朝平定云南的推进过程，明朝统治者对云南内部的民族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边疆地域特点的认识逐渐加深，采取了差异化的统治政策，导致明初在云南形成了行政管理上具有差异的三种方式和三个层区：第一层区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的云南腹里地区，即谢肇淛所谓的“滇中”。……第二层区为洪武十六年（1383年）征南大军“分兵下大理，下金齿，下临安、元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对洪武十七年（1384年）以后，遣使招附的最边远地区，即“又明年（洪武十七年），遣间使降车里，降緬，降八百”等地，明朝仅实现“咸以壤奠贡”，将其纳入明朝版图的目的。<sup>[6]151-152</sup>

可见，云南在行政管理的方式和层区是以滇

中为核心，成扇形结构向西南方向层层递减，这正符合周振鹤提出的“圈层结构”。云南府所在的滇中地区，也就是云南的核心区域，“明王朝采用与内地完全一致的统治方式，‘承制建官，大军镇焉’的统治政策”，并“密集设置军屯卫所，进行大规模的汉族移民”<sup>[6]152</sup>。第二层区属于“土流并治区”，行政区划方面既有府州县，又有土司，明廷在这一区域的军事要地和交通要道设置卫所进行屯守，一则可以震慑“诸夷”，二则可以拱卫“核心区”，我们姑且命名为“拱卫区”。最后一层是“羁縻区”，即“在夷地者，赋役、狱讼，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已”<sup>[7]</sup>。也就是说，明廷在车里、緬、八百等三宣六慰之地并不派官驻军，只是“正其疆界，明其爵级”<sup>[8]1483</sup>，进行羁縻统治。

据《大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sup>[9]</sup>所载行政区划，云南行政管理上的三个层区分层如表1。

表1 云南行政管理上的三个层区

核心区	拱卫区	羁縻区
云南府、澄江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军民府、武定军民府	大理府、楚雄府、临安府、蒙化府、景东府、广南府、镇沅府、永宁府、顺宁府、姚安军民府、鹤庆军民府、丽江军民府、元江军民府、北胜州、马龙他郎甸长官司、者乐甸长官司、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	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緬甸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府、孟良府、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威远州、湾甸州、镇康州、大侯州、钮兀长官司、芒市长官司

## 二、明代云南府的区位优势与战略地位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师征云南”<sup>[10]36</sup>，并于次年平定。平定云南后，先后设置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sup>[10]1171</sup>。明朝初平云南，即“置都指挥使司，领诸卫所”<sup>[11]3492</sup>。可见，明朝平定云南后，即在各地设立卫所进行戍守。

据《明史》卷四六《地理七》<sup>[10]1171-1197</sup>、卷九〇《兵二》<sup>[10]2211</sup>，万历《云南通志》卷七《兵食志第四》<sup>[8]592-649</sup>所载，明代在云南设置的卫所数量，洪武年间共计19卫13所，其中，核心区滇中五府占11卫5所，云南府占6卫4所。永乐年间共计19卫15所，其中，核心区滇中五府占10卫

6所，云南府占6卫4所。万历年间计为20卫21所，其中，核心区滇中五府占10卫8所，云南府占6卫4所。详见表2。

表2 滇中五府及云南府卫所占比

年代	名称	卫所总数/个	滇中五府占比/%	云南府占比/%
洪武年间	卫	19	约57.89	约31.58
	所	13	38.46	30.77
永乐年间	卫	19	约52.63	约31.58
	所	15	40.00	约26.67
万历年间	卫	20	50.00	30.00
	所	21	约38.10	约19.05

从表2的统计可以看出，自洪武年间平定云南，建立卫所镇戍制度至万历年间，滇中五府所在的核心区，卫一直占据云南总卫数的一半以上，千户所的占比在持续下降，这是因为明朝后期在偏远边疆区新设立的千户所数量多于在滇中核心区设立

的千户所。总体来说,在整个明代云南的卫所军事部署显示出典型的“内重外轻”格局。<sup>①</sup>尤其是如云南府这样的腹心地带,其驻守的卫所数量一直占整个云南卫所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说明明朝在云南布防的重点是以云南府为腹心的核心区。只有控制了核心区,才能控制整个云南,若云南府所在的核心区动荡不安,就会危及明廷对整个云南的统治,甚至土崩瓦解。

纵观整个云南,环滇池区域和环洱海区域是云南的两个中心。蒙元灭大理政权,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之畔的大理府迁到滇池之滨的中庆府(明朝平定云南后改为云南府),历经明、清、民国至今,云南府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军事中心。之所以如此,与云南的地理区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顾祖禹云:“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等帅师讨云南,分军出四川永宁趋乌撒,而大兵自辰沅出贵州向曲靖。此从来攻取之大势也。”<sup>[12]5041-5042</sup>由此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经过巴蜀与中原联系的交通状况,这一改变固然与秦汉和明朝时期京城的向背有关,但经贵州比之经巴蜀翻越秦岭更为方便则是不争的事实。今人胡阿祥在论及昆明的交通云:

从昆明向东,可沿黔道入贵阳,达湖广;向东北,可经威宁、七星关、毕节进入四川泸州,亦可由威宁北上,经彝良至四川宜宾;向北,可经禄劝、元谋通四川会理、西昌、成都;向西,可至大理、鹤庆乃至西藏;向西南,可至下关、保山,达中缅边境重镇畹町;向南沿昆洛公路可至打洛;向东南,经蒙自可到中越边境重镇河口;亦可经宜良、师宗、册亨进入广西。<sup>[13]</sup>

云南府所在的环境区域,自秦汉以来就是云南经济最为发达、物产最为丰饶之区,且适宜农耕。顾炎武对环滇池地区的经济富庶进行了精辟总结:

司马迁《史记》称滇池旁地腴饶,巴、氏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犍童、旄牛,以此巴、蜀殷富。而范蔚宗《后汉书》亦称滇

池河上(按:据《后汉书》应为“土”字)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倍(按:据《后汉书》应为“俗”字)豪怵,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由是观之,滇固非瘠土也。唐天宝以后,蒙氏以一隅之力,累抗王师,此即财力雄富之一验。今山川形势与古不殊,体息劳徕,垦田积粟,使其民成饶裕之俗,是在良有司矣。<sup>[11]3488</sup>

可知,虽然经过近两千年,滇池之富饶至明时亦未有大变。环滇池区域一直是云南经济最为发达、物产最为富庶之地。正是由于环滇池区域是云南最大的坝子,且不缺水源,这就为卫所在云南府驻军与屯田垦殖提供了深厚的经济与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明廷设置卫所实行屯田制度,所谓“天下皆有卫所,皆有军,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不与焉”<sup>[11]3520</sup>。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始终贯彻军事征战与卫所设置、屯田镇戍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促使大规模的军事移民进入云南”<sup>[6]79</sup>。而卫所驻地的选择与设置、屯田镇戍一般符合交通便利、军事要地及适宜农耕的区域。陆韧指出:“卫所御城的选址非常慎重,一般选在平川广原坝区的军事重要地方,即能有效镇戍地方,又需要有广阔的土地可供屯军耕种。”<sup>[6]111</sup>云南府也正符合这三项特征,《明史·地理七》载:

云南府。昆明。倚。东有金马山,与西南碧鸡山相对,俱有关,山下即滇池,池在城南。<sup>[10]1172</sup>

万历《云南通志》总结云南府的形势云:

东距蟠龙江,南滨滇海,西据碧鸡山,北枕螺山。<sup>[8]75</sup>

顾祖禹亦尝论及:

(云南)府控馭戎蛮,藩屏黔、蜀,山川明秀,屹为西南要会。<sup>[12]5061</sup>

由此可见,云南府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云南府作为云南的中枢根本之地,实关云南之存亡。顾祖禹和顾炎武皆认为:

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霭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

<sup>①</sup>这尚未计算毗邻滇中核心区但不在滇中五府境内的卫所,若不考虑政区原因,像楚雄卫、通海前千户所、右千户所、十八寨千户所等纳入核心区也未尝不可,若如此,则滇中核心区所占比例会更大。

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sup>[11]5057/[12]3488</sup>

若以云南府所在的滇池区域为中心，以到鹤庆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圈，则云南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卫所皆处在此圆圈之内，这一区域正与陆韧教授所说的“内边政区”<sup>[6]125-132</sup>相契合。简言之，云南府大致位于整个云南内边政区的中心，曲靖、元江、永昌、鹤庆四关拱卫着云南府的安全。

### 三、明代云南府卫所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于云南府设立都司卫所，迄永乐年间增置，终于万历、天启之际，云南府的卫所位置及数量大体稳定，现以明万历四年（1576年）云南府所辖卫所进行分析。现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七《兵食志第四》<sup>[8]597-617</sup>所载，云南府境内卫所位置、分布及所辖军堡、军哨数量统计如表3。

表3 云南府卫所位置及千户所、军堡、军哨数量统计

卫/所	位置	千户所/个	军堡/个	军哨/个
云南左卫	云南府治东	6	2	4
云南右卫	云南府治西南	6	2	10
云南中卫	云南府治东北	6	1	5
云南前卫	云南府治西南	5	1	3
云南后卫	云南府治东	5	2	3
广南卫	云南府治东	4	2	1
宜良守御千户所	宜良县治西	1	2	3
安宁守御千户所	安宁州治西	1	4	2
易门守御千户所	易门县治南	1	0	4
杨林守御千户所	嵩明州治南	1	1	2
合计		36	17	37

据表3统计，整个云南府辖境内共有6卫36千户所17军堡37军哨，其中，左、右、中、前、后、广南6卫所及其所辖的32千户所皆位于府治周围，其余州县只有4千户所。也就是说，云南府城周围集中了近九成的千户所。在这6卫中，有3卫布防在府治东边，分别是左卫、后卫和广南卫；有2卫布防在府治西南，分别是右卫和前卫；余下的中卫布防在府治东北，唯独府治正西、西北

及正北三面没有布防。

这6卫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以左卫、中卫、后卫、广南卫等布防于府治东边之卫所，另一方向是右卫和前卫布防于府治西南之卫所。这样的军事布防，是与云南府城的地理形势分不开的。其一，云南府城坐落于滇池北岸，南北各开一门，东西各开二门，素有“龟城”之说。府城之南是滇池，东邻盘龙江，以逆时针言之，府城之外围从东北延绵至西南，分别被商山、妙高山、王家山、进耳山、碧鸡山、太华山、罗汉山等环绕。依云南府城的地势论，东面、西南二面才是重兵防御的地区，故明廷以四卫处在府治之东，二卫处在府治西南。其二，云南府治正东，经过曲靖、贵州普安，向东直达湖广大道。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帅军征讨云南时，“主力就是从南京由湖广辰沅，由普安路进入云南。……正统年间曾调发数十万大军三征麓川，主要的进军路线也取道‘湖广普安路’。……‘湖广普安路’由此成为云南与内地和中央王朝联系的通道”<sup>[14]</sup>。正是由于府城东面通向“湖广普安路”，连接着中央王朝与云南腹里地区，所以才派遣重兵驻守，保障大道的畅通。其三，可以防范来自东方的攻击力量，并可迅速支援位于“湖广普安路”上的卫所，防止反叛力量截断与中原的联系通道。

位于府治西南的右卫和前卫，主要策应防范西南方向的卫所和来犯之敌。从府城的西南门出发，经过碧鸡关、安宁州，向西可达大理府，此二卫位于云南府至大理府的必经之路上。若有反叛力量攻打府城，或者从西向东攻打，镇守在府城西南的卫所就能及时策应，或镇守、或镇压，占据着军事制高点，从而拱卫府城的安全。

除了驻扎在府治周围的六卫，云南府所辖的其他州县亦分布有四个守御千户所。杨林千户所位于嵩明州治之南，恰好处在“湖广普安路”这条通衢大道上。顾祖禹云：“今为杨林驿，西去府城百里，为往来必经之道。”<sup>[12]5074</sup>杨林所距离关索岭不远，关索岭为滇东屏障，虽然“关索岭路本非正道”<sup>[12]5026</sup>，但由于“大都邮驿之设，以京师为向背”<sup>[12]5026</sup>，且明廷着力经营贵州入滇之路，故设置卫所镇戍。顾祖禹总结道：“（嵩明）州山川环结，土地饶沃，居然奥区也。而东达曲靖，西走会

城，尤为形要。”<sup>[12]5074</sup>杨林所之所以设置在嵩明州南不远处就是这个道理。杨林所与位于寻甸的木密所、凤梧所，曲靖的马隆所遥相呼应，四所成犄角之势，发生战事时可以互相应援。杨林所位于群山环绕的一个小平坝上，是云南府东面的军事战略要地，扼守着云南府的东大门，连接着出入滇中的要道上。

宜良千户所在县治之西，处于府城的东南。由云南府出发，经过宜良向南，可到开远、蒙自、河口，出境可达越南河内。也可向东，经今天的师宗到达广西，宜良适位于这两条交通线的交汇处。宜良坝子南北狭长，东西两旁山峰对峙，是绝好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在此地设卫所进行戍守，不但可以拱卫云南府城西南，守卫交通要道，还可以抵御东南方向出现的敌人。宜良所与曲靖府的六凉卫、广西府的十八寨所、临安府的通海所，共同构成了在云南府东南部的防御体系。

安宁千户所位于州治之西，在府城西南。从府城出发，经碧鸡关，就来到了安宁州，从安宁州南下可以到达临安府和元江府。从安宁州出南平关，一路向西，可到达滇西的核心地区洱海流域，这条道路是连接云南府与大理府的交通要道，从大理府向南可经永昌府出境，向北可到丽江府，乃至西藏。由于云南府至大理府这条道路极为重要，也是控制滇西、滇西南的快捷通道，故明廷着力经营。把卫所设在安宁州西就是为了控制这条要道，同时又有利于守卫南平关、炼象关、老鸦关等关隘。南诏阁罗凤谓：“安宁雄镇，为诸爨要冲。”<sup>[12]5070</sup>由此足见安宁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

最后一个易门千户所位于县治之南，易门县在府城及安宁州的西南。易门县并非位于交通要道上，但由于安宁州西南空旷，暴露在外，设置卫所镇戍可以保护安宁州的侧翼安全，且易门南部有黎崖山，可以依山据守。若安宁州西侧有敌人来犯，易门所守军就会向西绕道背后，与安宁所守军夹击来犯之敌；若敌人从滇池东岸进攻云南府城，易门所守军向东绕过滇池，协防府城南面，与府城守军夹击来犯之敌。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二十一年（1388年）间，麓川平缅土司思伦发反叛，率军从麓川进攻景东和定边。景东府“山川

环绕，群蛮错列，亦控阨之所也”<sup>[12]5148</sup>。陆韧指出：“麓川发动景东、定边进攻并非一般侵扰寇掠，而是试图争夺并控制进入云南腹心地区的交通战略要地，突破景东要冲，直插云南内地，凭借其侵占云南半壁江山的形势，近逼云南腹心地区，吞并云南。”<sup>[6]69</sup>易门西南即是景东，突破景东，就可进击易门，陆教授的分析从侧面证明了易门千户所设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麓川叛军并未进攻到云南府境内，但易门与景东处在东西一线上，若无易门，叛军攻下景东之后就会兵临安宁州，这就会造成被动防御的局面。安宁千户所与易门千户所互为声援，可以互相包抄，起到拱卫府城西南方的目的。

####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明代云南府战略位置及分布在云南府境内卫所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云南府处在王朝的核心区与边疆区的中间地带，从中原核心区的视角看，云南府无疑属于王朝的西南边裔之地；但从云南布政使司本身来看，云南府却是整个云南的中心，即云南府具有“边疆”与“中心”二元性政治地理特征。

第二，云南府所在的环境区域是云南经济最为发达、物产最为富庶的地区，且适宜耕种，四周坝子众多，卫所屯军可以进行大面积的屯垦，解决军粮及补给问题。

第三，云南府所辖卫所在布防上，主要考虑该地的交通、经济、军事等战略地位，呈现以府城为核心向四周沿着重要交通线和军事关隘扩散的态势，说明云南府所辖卫所的布防亦属于内重外轻。

第四，云南府所辖卫所的布防注重彼此之间的配合与互相支援。位于府治周围的六所，主要戍守在沟通东西方向的大道上，其中四卫位于通向东面的大道“湖广普安路”的方向上，东面的杨林所和东南的宜良所为其拱卫，并能互相策应。由于“湖广普安路”沟通联系着帝国中枢，是云南稳定的基石，故布防有四卫。位于府城西南的二卫面向通往滇西与滇西南的必经之路上，联系着滇西的“核心”环洱海地区。有明一代，滇西南的土司屡有反叛，鉴于此，明廷加强了对西南的防御。府城外围的安宁所与易门所为其拱卫，并且可以互相策

应，彼此之间呈犄角之势。

第五，布防在云南府治外围的杨林所、宜良所、安宁所及易门所，不但与戍守府城的六卫之间彼此策应，还与更外围的卫所之间形成彼此呼应的关系。这些卫所都建在重要的交通沿线上，同时又都考虑到军事防守与屯田的重要性，从而形成维护云南稳定和交通畅通的卫所群。正是通过卫所之间的联控布防，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才能从云南府向四周犹如波纹一样推展开来。

#### [参考文献]

- [1] 徐元浩. 国语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6-7.
- [2] 周振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总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99.
- [3] 鲁西奇.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4] 施坚雅.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导言 [M] // 叶光庭, 徐自立, 王嗣均, 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3.

- [5] 尹建东, 王世丽, 马勇. 汉唐时期西南地区的豪族大姓与地方社会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6.
- [6] 陆韧. 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7] 谢肇淛. 滇略: 卷9 [M] //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6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771.
- [8] 万历《云南通志》 [M]. 邹应龙, 修. 李元阳, 纂.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
- [9] 李贤. 大明一统志 [M] //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7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171-221.
- [10]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云南贵州备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2]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云南方輿纪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3] 胡阿祥. 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 [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6: 633-634.
- [14] 陆韧. 高原通途: 云南民族交通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70.

(上接第11页)

龙莺的妈妈为寻求发展去上海读书深造，龙莺最初因父母的矛盾冲突而烦恼、担心，后来她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追随好学上进的妈妈，并说服了犹疑不决的爸爸。可以想见，龙莺在走向上海大都市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系列“挫折”，但我们理由相信，她的融入必然更自觉、更顺利。作家通过对两个孩子及其家庭发展走向的书写，让我们看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带来的是更和谐、更重视沟通的现代亲子关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童年的“生命力量”。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以儿童为本位，走进儿童的生命空间，在表现和认同儿童独特价值观的同时，引导着儿童进行生命的自我扩充和超越的文学。”<sup>[5]</sup>显然，雪飞和龙莺这两个儿童形象都充满了不断成长、积极建构自我的“主体性”，他们的言行、思想传递出一种朝气蓬勃、充满行动力的当代童年精神，也体现出作家对当代童年精神和文化意义的深刻理解。

在商业化、网络化的今天，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需要更加努力从儿童的真实生活出发，进而触摸

和深刻展现童年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非表象式的审美观照才能让儿童小说显示出其艺术审美的广袤和深厚的一面。《龙抬头，猪会飞》以一种大巧若拙的朴素书写，表现了当下“常态化”儿童的生活面貌和成长轨迹，展现出社会发展对童年生活的影响。作家对本土化、民族化童年的宏观把握和美学思考，既为当下的童年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参照，也为儿童小说注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 [参考文献]

- [1] 李学斌. 龙抬头，猪会飞 [M].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
- [2] 任大霖. 儿童小说创作论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 [3] 李学斌. 儿童文学的多维阐释 [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324.
- [4] 方卫平, 赵霞. 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 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 [M].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 [5] 朱自强. 儿童文学的本质 [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 237.